

中国秘书简史

詹绪佐 杨树森 李先华
编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

C931.46

32

230/231

中国秘书简史

詹绪佐 杨榭森 李先华 编著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对许多秘书发展史上存疑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将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近 50 年的秘书工作发展过程写进秘书史,还是一个尝试。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教材,我们注意吸收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成果,包括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成熟的观点和材料,在此谨向原作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本书各章编写分工:

詹绪佐,1-7 章(上卷暨南北朝部分)

杨榭森,8-9 章(隋至元七个朝代);13-15 章(晚清民国)

李先华,10-12 章

詹绪佐

不妥之处,恳请同

安徽大学出版社

20 日

中国秘书简史

詹绪佐 杨树森 李先华 编著

安徽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230039)

肥西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25 字数:285千

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00

责任编辑:徐成志、高兴 封面设计:孟献辉

ISBN 7-81052-138-1/G·37 定价:16.5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前 言

本书是为适应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需要而编写的。

根据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制定的秘书专业考试计划,开设《中国秘书简史》这门课的目的,是让考生“了解中国历代(尤其是近现代)秘书工作的概况,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分析、甄别其中可供借鉴的历史经验,为现实的秘书工作服务”。但到目前为止已经出版的中国秘书史读本,均没有辛亥革命到当代的秘书史的内容,而这一部分内容又是考试计划中特别强调的重点内容,因此专门编写一本适合高校秘书专业教学和高等教育自学考试需要的中国秘书简史教材是完全必要的。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查阅了大量史料,对许多秘书发展史上存疑的问题进行了认真探讨,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将辛亥革命以后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近 50 年的秘书工作发展过程写进秘书史,还是一个尝试。需要说明的是,作为教材,我们注意吸收了一些专家的研究成果,包括一些我们认为比较成熟的观点和材料,在此谨对前辈学者表示敬意和感谢。

本书各章撰稿人为:

詹绪佐:1-7 章(上古至南北朝部分)

杨树森:8、9 章(隋唐宋辽金部分)和 13-15 章(现当代部分)

李先华:10-12 章(元明清部分)

由于时间仓促,参考资料有限,本书难免有不妥之处,恳请同行专家和读者批评指正,以便在再版时予以改正。

作 者

1998 年 2 月 20 日

目 录

前 言	(1)
第一章 中国秘书工作探源	(1)
第一节 传说时代的“史影”	(1)
第二节 夏代的秘书工作	(6)
第二章 商代的秘书工作	(12)
第一节 秘书人员和秘书机构	(12)
第二节 文书档案工作	(17)
第三节 公文名篇举要	(24)
第三章 西周的秘书工作	(28)
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28)
第二节 文书档案工作	(35)
第三节 采风观政	(43)
第四节 重要秘书和公文名篇	(47)
第四章 春秋战国的秘书工作	(54)
第一节 秘书人员	(54)
第二节 文书工作	(59)
第三节 档案工作	(70)
第四节 重要秘书和公文名篇	(75)
第五章 秦代的秘书工作	(80)
第一节 秘书人员和秘书机构	(80)
第二节 文书工作	(86)
第三节 档案工作	(93)
第六章 汉代的秘书工作	(97)

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97)
第二节	文书工作	(110)
第三节	档案工作	(116)
第四节	重要秘书和公文名篇	(120)
第七章	魏晋南北朝的秘书工作	(126)
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126)
第二节	长官和秘书的关系	(132)
第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	(136)
第四节	重要秘书和公文名篇	(146)
第八章	隋代和唐代的秘书工作	(152)
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152)
第二节	唐代的文书档案工作	(157)
第三节	隋唐两代重要秘书	(164)
第四节	唐代公文名篇举要	(166)
第九章	两宋和辽金的秘书工作	(171)
第一节	宋代的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176)
第二节	宋代的文书档案工作	(180)
第三节	宋代重要秘书简介	(182)
第四节	宋代公文名篇举要	(187)
第五节	辽金秘书工作概况	(191)
第十章	元代的秘书工作	(191)
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199)
第二节	文书档案工作	(204)
第三节	重要秘书和公文名篇	(208)
第十一章	明代的秘书工作	(208)
第一节	秘书机构和秘书人员	(216)
第二节	文书档案工作	(224)
第三节	重要秘书简介	(227)

第四节	公文名篇举要·····	(232)
第十二章	清代的秘书工作·····	(232)
第一节	秘书机构·····	(248)
第二节	秘书人员·····	(257)
第三节	文书档案工作·····	(274)
第四节	重要秘书简介·····	(276)
第五节	公文篇目举要·····	(284)
第十三章	民国时期的秘书工作·····	(284)
第一节	南京临时政府的秘书工作·····	(290)
第二节	北洋军阀政府的秘书工作·····	(294)
第三节	南京国民党政府的秘书工作·····	(300)
第四节	民国重要公文·····	(303)
第十四章	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革命政权的秘书工作 ·····	(303)
第一节	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的秘书工作·····	(303)
第二节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	(305)
第三节	抗日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	(312)
第四节	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秘书工作·····	(318)
第五节	中共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重要公文·····	(322)
第六节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领导下的秘书工作的特点 ·····	(325)
第十五章	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秘书工作·····	(327)
第一节	建国初期的秘书工作·····	(327)
第二节	“文革”时期的秘书工作·····	(333)
第三节	新时期秘书工作的恢复和发展·····	(334)
第四节	建国以后的重要公文·····	(346)

第一章 中国秘书工作探源

中华民族的历史十分悠久,中国的秘书工作也源远流长。

秘书工作自来就属于社会权力机构(其发达形态是国家)的辅助性工作,它是管理工作中不可或缺的一个环节,以文书工作为其重要业务内容。由此,我们就不难推知,秘书工作的产生既离不开文字,也离不开社会权力机构,二者互为因果,构成了秘书工作的前提条件。

前提条件既明,那么秘书工作得以产生的标志也就可想而知了。这标志也有两个:一是公务文书;二是秘书人员。这二者也是互为条件、密切相关的。

下面我们就循着这样的思路,对我国的秘书工作的起源作一些粗线条的勾勒。

第一节 传说时代的“史影”

“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我国秘书工作的源头由于历时久远,史料阙如,我们已不可能言之凿凿了。因此,这里所作的探源,也只能是就古代的传说和零星的记载去追寻那“当时已惘然”的一些“史影”。下面谈几点。

一、“契刻”说与最早的私人文书

汉字的起源是多元并进的,“契刻”便是其中的一元。

据古书上记载,在很久很久以前,原始先民们就学会使用刻符记事的方法。所谓刻符,也就是遇到什么事或要向他人和异地传达什么消息,就在木板、木片上刻些缺口或其他记号,其目的在于

“刻其数”^①以备忘，并带有契约、凭证的性质。从这一角度上说，汉字数目字当中的积画，如“一”、“二”、“三”，以及错画的“×”（五）、“八”（六）、“十”（七）等，都来源于契刻，恐怕还是很有道理的。但遗憾的是，由于古今悬隔，历时太久，远古时的那些契刻材料迄今尚无发现，难知其详。我们现在所能见到的，只有仰韶文化遗址出土陶器上的一些刻划符号。这些刻划符号距今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被许多文字学家视为中国文字的源头。虽然说它们的性质和作为“契约”的“契”并不能简单地划一等号，但其间的血脉关系还是显而易见的。

值得我们注意的，倒是“契”字的构形本身。“契”是一个复合结构，由三部分组成：“丰”就像刻出齿的木板形；加上“刀”旁，表示用刀来契刻；再加个“大”字，则表明是大的契约^②。由此可知，“契”作为动词，表示契刻，这是从制作手段上说的；而“契”作名词之用，则是指契约，这又是从功能作用而言的。“契”的异体写作“桀”，字从“木”旁，正表明刻木为契，以为凭据。

根据古代的传说，伏羲氏曾教民众以两片木板相并合，在当中刻上几道痕，记住数目，然后各持一片，作为凭据。这就是传说中最早的“契”。“契”既然是最早出现的契约、合同，当然也就是私人文书的启端了。

二、“仓颉造字”说的启示

中国文字的起源，自古以来就众说纷纭，其中影响最大、流布最广的当数“仓（苍）颉造字”说。这一说法导源于战国时代，如《世本》上说：“苍颉作书。”又说：“沮诵、苍颉，黄帝之史官。”另外，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都有类似的记载。到了汉代，这类传说更加流行，也越来越神圣其人。汉武梁祠中有仓颉造字的壁画；汉碑

① 刘熙《释名》：“契，刻也，刻识其数也。”桂馥《说文义证》：“谓刻其旁为齿也。”《列子·说符》：“宋人有游于道而得人遗契者，归藏之，密数其齿，曰：‘吾富可待矣。’”

② 许慎《说文解字》：“契，大约也。”所谓“大约”，也即是大的契约。

当中有《苍颉庙碑》；而《淮南子》上则有“苍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的神话；到了纬书家手里，仓颉竟成了“龙颜侈侈，四目灵光”的神奇人物，还具有“生而能书”的“特异功能”。这些传说显然是荒诞不经的，但其中也确实包含着一些“史影”可供我们去寻绎。

从一个角度上说，“仓颉”是否确有其人呢？这本身就值得我们去探秘。这是因为，远古人们并不像后代文明社会的人一样，都具有明确的私名。传说中的上古人物的名称，大多是后人依据某一特征而另起的名字。其中有一条非常重要的起名原则就是依照发明创造的丰功伟绩。比如“有巢氏”指的是发明造房屋的祖先，“燧人氏”指的是钻燧取火的发明者，“庖牺氏”则是由“养牺牲以供庖厨”而得名的，“神农氏”又是指最早开创农业的神——人格化的代表。由这一原则加以类推，“仓颉”也很可能是具有同样性质的名称。从古代的读音上说，“契”与“颉”音相近，那么，“仓颉”也许就是“创契”（亦即“创造文字”）的意思。假使这一推断不无道理的话，所谓“仓颉”就应当是对创造文字的史官的追称^①。而借助于这一推测，我们至少可以获得这样几点启示：

首先，“仓颉”既然是“创契”，那就表明黄帝时期（距今约4500年左右）的文字不仅已经出现，而且比以前那些刻符有了较大的改进。关于这一点，现在已被同一时期出现的一些陶文所证实。例如在大汶口晚期文化遗址的三件器物上都出现一个非常形象化的字：下面山峰并立，山之上是云气，云气之上是太阳，意思是一轮红日在云气缭绕中冉冉上升，高出山巅。专家们指出，这个图形文字与商周时甲、金文的“旦”字，非常相似，显然是后者汲取、借鉴的材料。另外，黄帝时期被一些史家誉为是“发明狂”的时期，据说当时在养蚕、舟车、音乐、医学、算数、炼铜、阵法等方面都有突飞猛进的伟大发明。在此生产发展、门类增多、公共管理事务日趋复杂的背

^① “史官”这一名称，始见于商代，黄帝设“史官”，可能是后人将当时的官职，套用于黄帝时期，故曰“追称”。

景下,文字的发明与改进是完全有可能的。

其次,“仓颉”既然是对创造文字的史官的追称,那就暗示了黄帝时期可能就已经有了类似于史官的工作人员。而史官的出现,又恰好是秘书工作发端的一个标志。据古书上记载,黄帝时期为了适应管理的需要,不仅设置了“六相”的官职,以分管各方面的工作,而且也设置有史官,其中见之于载录的就有仓颉、沮诵、孔甲、大挠、隶首、宾成等多人。这些史官掌握了最高的文化知识,又陪伴于首领的身边,成为天意的权威阐释者,充当着人与神交往的使者,他们的出现,标志着秘书人员的诞生。

再次,黄帝时期既有了文字的重大的改进,又出现了不少类似于史官的工作人员,那么公务文书的出现也就是情理当中的事了。黄帝以前的氏族首领,如前面引到的“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庖牺氏)”、“神农氏”,大多以语言来发布指令,因此那时产生文书的可能性不大,所谓“神农无制令而民从”(《淮南子·汜论训》),指的就是这种情况。《后汉书·祭祀志》上说:“自五帝始有书契。”“五帝”的组成有多种说法,比较通行的,指黄帝、颛顼、帝喾、唐尧、虞舜。既然“五帝”之首是黄帝,可知公务文书的出现当始于黄帝。而公务文书的出现,也恰恰是秘书工作发轫的另一个标志。据《左传·昭公十二年》上记载,春秋时楚灵王说过,他的“左史”倚相是一位“良史(很好的史官)”,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这几部书,历来学者认为这几部书是我国最古的书,其中《五典》为五帝所作,这表明可能到春秋时还有黄帝时期的文书传世。此外,传说黄帝曾命大挠作甲子以记时日,命容成制历法以定农时,又让隶首作算数,这些传说也隐隐透露出当时可能有文书出现。

正是基于以上几点推测,我们认为,中国秘书工作的源头大体上可以追溯到黄帝时期。

三、进善旌、谤木、谏鼓、纳言

传说中的五帝,相当于父系氏族社会,其时已进入了铜石并用

的时期。在社会生产力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私有制开始萌生,管理事务也趋于繁杂,因而古代典籍中有关秘书工作现象的记载明显增多,这突出地表现在“尧舜之治”的传说上。

《史记·文帝本纪》上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这里所说的“古之治天下”,指的就是尧舜治理天下的时代。据《大戴记·保傅》、《淮南子·主术训》、崔豹的《古今注》以及《后汉书·杨震传》记载,尧在位的时候,曾在朝廷前设置了一面旗帜,史称“进善之旌”,让百姓站于这面旗帜下向他指呈对政事的意见和主张,这一招很灵验,一时之间,进善言提建议的人很多。当时,洪水泛滥成灾,尧派鲧去治水,鲧因治水方法不当,历时多年,劳民伤财而水患仍然未除,加之一些恶人为非作歹,致使民情激愤,怨言四起。于是,尧命舜巡行天下,考察民情。舜虽然不辞劳苦,四处巡视,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办事有遗漏,出差错,便在自己的门前设了“诽谤之木”^①和“敢谏之鼓”。所谓“诽谤之木”,就是在门前立了一根木柱,无论谁发现了舜的过失,都可以在木柱前,大胆地指出来,由安排在木柱前的书记员记录下来,转告给舜。所谓“敢谏之鼓”,就是在门前放上一面大鼓,无论是哪个人想荐贤良之士,想献治国之策,都可以击几下大鼓,舜就接见他们,听取意见。通过这种办法,舜得知颛顼帝的八个子孙、帝喾的八个子孙,世代贤德,为百姓办了不少好事,舜便委以重任。舜又得知帝鸿氏的后代混沌行凶作恶,包庇奸邪;少皞氏的后代穷奇不讲忠直信义,散播凶言恶语;缙云氏的后代饕餮唯利是图,贪求财货。舜便将这些凶恶的家族发配到边荒之地。舜还听说在丹水的丹朱鼓动南方的三苗发生叛乱,便亲自率众,前去讨伐。此外,舜见鲧治水多年,毫无成效,就将他免职,发落到了羽山。在这段传说中,“进善之旌”、“诽谤之木”和“敢谏之鼓”开了我国信访工作的先河。

^① “诽谤之木”简称“谤木”。“谤”与“诽谤”指一般的议论、指摘过失或提出意见,不含贬斥色彩。由于此木是舜所立,舜又名重华,所以又称“华表”。

舜继位之后,将权力机构加以改组,设立了九官以治理天下;这九官是司空、后稷、司徒、士、共工、虞官、秩宗、典乐、纳言。其中纳言一官,命龙(人名)来担任。《尚书·尧典》载:“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大意是:舜帝说:龙呵!我非常讨厌那种说坏话和阳奉阴违的人,因为这种人常常以一些错误的话使我的民众震惊。命令你担任纳言的官职,早早晚晚,或代我发布命令,或向我回报下面的意见,都必须忠诚老实。”)其中纳言一词,郑玄解释说:“如今尚书,管王喉舌也。”孔安国则解说道:“纳言,喉舌之官也,听下言纳于上,受上言宣于下,必信也。”可见它是一种上通下达、出纳君命的官员,当是典型的秘书官职了,故而有的史家称之为秘书部长。

要而言之,我国的秘书工作当起源于黄帝时期,至迟也应肇端于尧舜时期。

第二节 夏代的秘书工作

“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十七年而帝舜崩。……禹于是遂即天子位,南面朝天下,国号曰夏后,姓姒氏。”(《史记·夏本纪》)

夏民族、夏朝代、夏文化,是我们中华的立国基点。不认识或不承认这一点,都是违背历史事实的。在本节中,我们拟对这一朝代的秘书工作作一初步的探讨。

一、国家的出现与文字的成型

我国国家形成于何时,学术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大致说来有以下诸说: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尧舜时期、夏、商和西周。然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公元前 21 世纪的夏朝是我国国家的开始。

国家的形成既少不了条件,也离不开标志。恩格斯曾精辟地指出国家形成有这样两个标志:其一,按地区划分国民;其二,公共

权力的设立。从这两方面来看,夏之为国是完全符合“国格”的。

先说第一个标志。夏禹时代,炎黄、东夷、苗蛮等部族之间的交往已相当频繁,以地缘为基础的华夏民族共同体已初步形成,“茫茫禹迹,划为九州,经启九道”(《左传·襄公四年》),原始的“九州”地域观念已经形成。虽然其时血缘亲族因素在共同体内依然顽强存在,但已不再是划分人群的首要依据了。《庄子·天下篇》说禹“置万国”,《左传》、《国语》上说禹会诸侯于会稽或涂山,均可证明夏禹时代确实已经试图剪断血缘纽带而代之以地缘联系了。然而,更重要的还在于,夏禹时代公共权力也已设立,其物化形式表现在建立了军队,制定了刑法(《左传·昭公六年》记“夏有乱族而作禹刑”,《世本》称“夏作赎刑”),修造了监狱(《今本竹书纪年》称“夏台”、“圜土”),“这些东西都是以前的氏族社会所没有的”(恩格斯《家庭·国家和私有制的起源》)。此外,从古籍记载来看,夏王是最高统治者,他的下面设有六卿分掌各方面事务,称“六事之人”,还有牧正、庖正、车正(即管理畜牧、膳食、车旅的官职)等一系列职官,并设立了贡赋制。凡此均表明夏朝已初步建立了国家机构。1958年以来,豫西一带夏文化考古发现甚丰,特别是在二里头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工具、兵器和礼器,更有大量石制家具和陶器,还发现了大型宫殿基址以及墓葬大小不均、随葬品多寡悬殊的现象,这些更是足以证明夏王朝绝非子虚乌有。

国家的出现与文字的成型本来就是相伴而生的,它们共同构成了国家公务文书和国家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必备的条件。诚如斯大林所说:“生产往前发展,出现了阶级,出现了文字,出现了国家萌芽,国家进行管理工作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

那么,夏朝的文字是否成型,初具规模了呢?回答当然是肯定的。

据李先登《夏代有文字吗》一文^①介绍,登封王城岗遗址出土的一些陶文,其形体结构已较大汶口发现的陶文前进了一大步,已经是真正的文字了。它上承仰韶文化和大汶口文化的陶文,下启殷商的甲骨文,其产生的时代正处于夏初。因此,可以推断,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大致出现于夏朝初期。换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很难设想,夏代的文字若没有相当发达的基础,殷商时的甲骨文会有那么高度的成就。倘若没有这几百年的长期积累,又怎么可能出现甲骨卜辞那样丰富多彩的词汇、灵活多变的文法、风格多样的书法和精湛的刻字艺术?

正是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尽管夏代的文字迄今还没有大批地发现,但夏代作为我国阶级社会的开端,出现成体系的文字,应当是不成问题的。

因此,我们也可以肯定地说,夏代,国家秘书工作产生的两个条件——出现了国家,有了初成体系的文字——均已具备。

二、夏代的官方文书和史官

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初具系统的文字的出现,夏王朝当然“需要比较有条理的文书”。尽管迄今为止,我们尚未发现那时的实物材料,但揆诸史籍至少有这样几则比较可靠的证据:

(1)《国语·晋语》载:晋文公时,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国语》是信史,这则记载可作为夏朝已有文献记录的旁证材料。

(2)《论语·八佾》载:“夏礼吾能言之,杞(夏的附属小国)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言之矣。”这就是说,“文献”并非没有,只是“不足”而已。孔子的这一慨叹反倒告诉我们,他或多或少是接触过夏朝或直接属夏朝的文件档案的,这些显然是夏朝的官方文书。

^① 此文载《文史知识》1985年第7期

(3) 细察《史记》诸本纪,可以看出,其《五帝本纪》所述的远古帝王世系不仅不能连贯,而且矛盾不少,这说明五帝谱系的来源不是历史文献,而是神话传说材料。然而,《夏本纪》和《殷本纪》所述的帝王世系却相当完整,井然不乱。过去虽有人对夏、殷本纪所记的历史表示怀疑,但自王国维以来历史学家对甲骨文的研究,已证明《殷本纪》与甲骨文反映的世系几乎是完全吻合的,由此可以相信《夏本纪》系谱的可靠性。我们很难设想,假使没有比较原始的夏王朝谱牒,仅凭口耳相传的材料,能编制出如此明确清晰的夏朝帝王世系。这就表明,夏之先人也一定是有册有典的。如果我们把《夏本纪》和《竹书纪年》中夏代帝王世系表相比照,可见二者几乎没有出入,这也正好说明二者当是以同一份原始的文献记录作为依据,那就是夏代传下来的夏王朝谱牒。

另据《吕氏春秋·先识览》等书记载,夏朝末年,夏桀(第十七个王)荒淫残暴,行将灭亡之际,掌管文书档案的“太史令终古”取出官藏的“图法”(《太平御览》引作“图书”,亦即国家的典志、档案)展示给夏桀看,对桀哭谏。然而夏桀仍执迷不悟,终古只得携“图法”投归了商汤。这一则记载很重要,它至少告诉我们这样三点讯息:其一,夏朝不仅有典有册,而且有了像“终古”这样的秘书官员。其二,这些秘书官员已开始把文书档案工作视为自己的重要业务,同时他们还负有劝谏君王的职责。其三,“终古”劝谏无效,遂携“图法”出奔之举,说明时人已然认识到秘书人员、秘书工作的重要作用,认识到文书档案对国家存亡兴衰确实所系极重。

总而言之,夏朝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立国基点,其时公务文书和秘书官员这两个国家秘书工作产生的标志都已经出现,所以夏代应当是我国国家秘书工作的开始。

三、公文名篇举要

夏王朝建立伊始,对内,为了镇压奴隶的反抗、抵御外族的入侵,建起了封闭式的城堡;对外,为了掠夺财富和奴隶,进行了扩张

性的战争。这本是奴隶制国家职能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由于当时战争频繁,故而公务文书就少不了讨伐敌人的军事动员令。

据《史记·夏本纪》载:“启遂即天子之位……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将战,作《甘誓》。”《甘誓》就是夏开国帝王启讨伐有扈时发布的檄文,全文如下:

《尚书·甘誓》

大战于甘,乃召六卿。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命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于祖,弗用命,戮于社,予则殍戮汝。”

〔参考译文〕

将要在甘进行一场大战,夏启便召集了六军的将领。启王说:“唉!各位将领和士兵,我向你们发布以下的命令:有扈氏轻蔑地对待自然规律,怠慢甚至放弃正朔大典,上帝因此要废弃他的大命。现在我奉行上帝的意志去惩罚他们。兵车左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箭射杀敌人,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兵车右边的兵士,如果不善于用矛刺杀敌人,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驾驶战车的士兵,不懂得驾驭战马的技术,便是不具备完成命令的本领。努力完成命令的,便在先祖的神位面前行赏;不努力完成命令的,便在社神面前给予惩罚。我要把你们这些不努力完成任务的人变作奴隶,以示惩罚。”

这篇檄文,许同莘《公牍学史》中有一段精当的点评:“首二句史臣记事。‘威侮五行’二句,申有扈之罪。‘恭行天罚’句,申明出师之意。以下则皆申军纪以誓众。文止数十言,而包举无遗,古书简要如是。”

“誓”,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公务文书,属王命文书之一。除上引《甘誓》外,还有《汤誓》(商)、《牧誓》(西周)等。这类誓师之辞有相